

大众周末

■ 新闻关注



越南举办奥黛文化节 展示长衫文化

越南举行奥黛文化节。奥黛是越南的民族传统服装，被称为越南“国服”。通过丰富多彩的奥黛服装表演，展示越南长衫的独特魅力。



安倍会见新日本小姐 邀其从政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见了维新党党首松野赖久的次女、“2016日本小姐大赛”冠军松野未佳时说，“你很像你的父亲”。松野则称，“我希望成为像首相您一样有信仰的人”。安倍似乎有意邀请松野出马，表示“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就从自民党开始”。



白人贫民窟 遭受黑人歧视的白人

在南非的黑人中间有一处白人贫民窟，大多是有着荷兰血统的白人。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安全保障，食物匮乏。当地的医院拒绝为他们诊治。这个曾经战胜了种族隔离制度、反对歧视黑人的国家，现在又陷入了歧视白人的怪圈。



澳年轻夫妻辞掉工作 开车环游世界

澳大利亚一对年轻的夫妻亚历克斯和妻子米凯拉，他们决定辞掉工作去世界各地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与社会文化，计划在三年内走遍六大洲和60个国家。

■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高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秘书长，之前曾两度任职于团中央。高勇曾在胡耀邦身边当秘书，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即使后来不再在胡耀邦的身边工作了，高勇依然与胡耀邦及其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他家里墙上一个显著位置，挂着胡耀邦生前题赠的一幅字“孜孜不倦”。凝视着这幅题字，高勇说：“‘孜孜不倦’是耀邦同志对我的鼓励，也是他一生工作、学习的真实写照。”

高勇：我眼中的胡耀邦

□ 余伟

一次拿错稿子的往事

高勇说，他常常听胡耀邦说“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总要有几句话能打动人心，总要给人以启发”。由于胡耀邦的讲稿大多是自己亲自动手撰写的，他讲话从来没有出现过“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那种笑话。而且，就算是别人把他的讲话抄错了或者打印错了，他也能一眼看出来。高勇对曾经发生过的一次拿错稿子的往事记忆尤为深刻。

1960年5月4日，首都青年和各界人民5万多人，在故宫太和殿的大院里隆重集会，支持土耳其人民爱国主义斗争，中央决定由胡耀邦在此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接到中央文件通知是在5月1日，胡耀邦立即着手起草讲话，时间相当紧迫。经过一天一夜的突击，打印出了讲话初稿。

5月3日上午，胡耀邦带着另一位秘书李彦去向当时分管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请示。刘澜涛看了讲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胡耀邦回来后立即动手改写，他写一段，高勇抄一段，打字员打一段。几个人从5月3日一直奋战到4日凌晨1点。因为4日上午9点开大会，这时秘书们都劝胡耀邦先去睡觉，他们继续抄清打印，到4日凌晨4点讲稿打印完毕。

谁也没想到，精心准备的讲稿出了问题。8点20分，高勇、李彦、李汉平三位秘书随胡耀邦一起出发去参加大会。在车上胡耀邦要看讲稿，高勇递上一份。“他看着看着‘嗯’了一声，接着说，‘这里漏了一段嘛！’”高勇和李彦顿时紧张起来。李彦也赶快拿了一份看。李彦说：“没有错，没有漏。”胡耀邦说：“明明漏了一段嘛，怎么说没有漏？”这时胡耀邦问高勇：“带底稿没有？”“没有。”高勇说。

“我压根也没想到带底稿，因为几个人校对的，谁会想到出错呢！”高勇后来回忆说。高勇提议先送他们去会场，自己马上回去取底稿。他急急忙忙地赶回去拿底稿一对照，果然是漏了一段，这一大段约300字。当高勇取了底稿回到会场时，已经到了预定开会时间。胡耀邦着急地问高勇：“怎么办呢？”高勇说：“漏的这段我给您补抄到您这份讲稿上，但主席台上的稿子和给记者的稿子都来不及改了，只能告诉记者报道时以您的讲稿为准。”胡耀邦表示同意，也只能这样了。

由于这个差错的发生，大会推迟了20分钟。这件事给大家都留下了一个教训，高勇说：“由于讲稿是耀邦自己设计、自己写的，而且修改了多遍，所以他一眼就能看出哪里出了错。若是那种自己不动手，只会照本宣科的，就是出错再多，恐怕也发现不了。”

“狮子窝”里垦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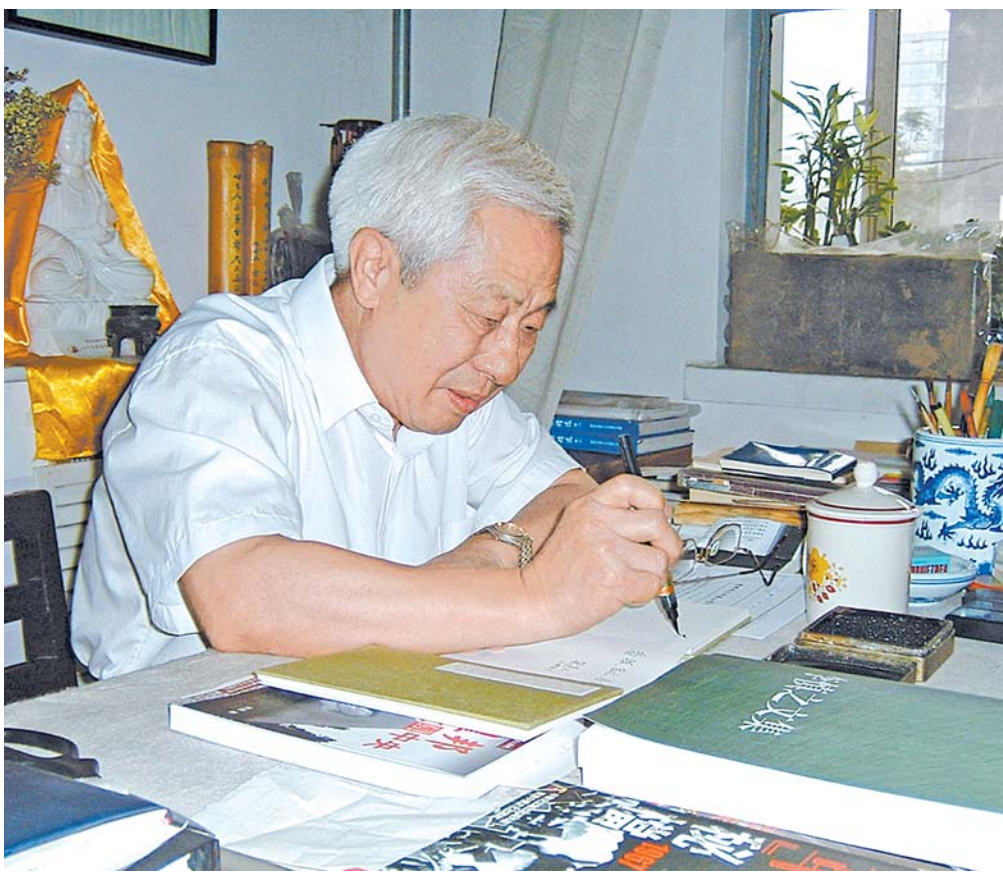
平时，高勇等工作人员还经常听胡耀邦说这样一句话，“劳动就要像个劳动的样子”。这句话，在高勇的心里也深深扎了根。

1961年秋天，胡耀邦带领秘书、警卫、司机，在北京西山山顶上叫作“狮子窝”的地方，找了一块荒地，作为劳动基地，既贯彻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又想借此搞点粮食，以补口粮之不足。胡耀邦带领大家一起翻地、播种，种上了冬小麦。“他干起来就顾不上休息了。他不休息，我们也不好休息。”高勇说，有时工作人员干活累了，就故意劝胡耀邦抽支烟。这样，胡耀邦才会停下来，大家也乐得趁机休息一下。

有时带的水喝光了，下山取水又不方便，就从山上一口井里就地打水，那井里还蹦着蚂蚱。“我们用几块石头把水桶架起来，拾了柴来烧。烧开后，耀邦和我们一起用茶缸舀了喝。”

大家对这个劳动基地相当有热情。第二年入夏后，小麦长势不错，一天一个样，高勇心里甜丝丝的，因为一年的劳动成果将要收获。看看将近黄熟，他就每两三天去看一次，估量哪天可以收割。

不料，有一天高勇竟然发现小麦一夜被人偷割光了，他感到非常心疼和气愤，回来报告



如今，高勇已是耄耋老人，他和夫人皓首相伴，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一栋普通住宅楼里过着宁静的老年生活。

了胡耀邦。

胡耀邦只是平静地抬起头来简单地说了三个字：“被偷了？”高勇又生气又觉得可惜，“是昨天晚上偷的，前天上午我去看时觉得还不成熟，再过两三天割正好。”胡耀邦却嘻嘻一笑，大度地说：“偷就偷了吧！”一年的劳动就这样白干了，高勇有点想不通。胡耀邦开导他说，“你不要这么想问题嘛。你要想，我们总是为社会增加了财富嘛！至于这财富归了谁，这是另一个问题。不管归了谁，都是为整个社会增加了财富。”听他这么一说，高勇便也不好再说什么，记得当时只说了一句：“唉！真气人！”就退了出来。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从1959年开始，粮食定量也一减再减。那时，高勇的定量由最初的每月31斤减至27.5斤，又没有副食品，他常常吃不饱，饿肚子。像胡耀邦这一级的干部，每月也只有4斤肉、3斤鸡蛋的“特供”，“这本来就远远不够吃的，而耀邦上有老母、岳母，下有幼子、幼女，加上不断来客，那么一点‘特供’，吃到他嘴里能有多少！”“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饿了，李汉平有时给他煮一小碟带皮花生，或在锅里烙几片白薯，端给他吃。”

家乡送来了土特产

即使生活这样艰苦，胡耀邦从不允许别人为他搞特殊化。高勇记得，胡耀邦的家乡曾给他送过两次土特产，都被他照价算钱退还。

上世纪60年代初，胡耀邦的家乡浏阳和大队为了发展生产，想要买一台发电机。由于当地买不到发电机，大队党支部书记龚光繁托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和胡耀简，于1960年底到北京来向胡耀邦求助。同时，经过党支部研究，请胡耀福和胡耀简给胡耀邦带了一点家乡的土产冬笋和芋头，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点情意。

高勇说，当时胡耀邦认为大队买一台发电机搞生产是一件好事，答应为他们买。事后由李汉平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运回浏阳后用于大坪煤矿挖煤。“但耀邦对胡耀福、胡耀简用公款作路费以及带来的冬笋和芋头，却很不同意，当时就批评了他们。”对此，高勇认为，中和大队这样做其实并不过分，“为生产大队集体购买发电机，派人到北京，理所当然地应该由生产大队出路费。带一点家乡土产表示心意，也在情理之中，本来无可指责”。

高勇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61年的1月12日。

胡耀邦把高勇叫过去，让高勇给他拿信纸，他要写封信。高勇随即拿了一本信笺给他。胡耀邦十分认真地给中和大队党支部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提出了严厉批评。信里，胡耀邦也表示“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并且，他还在信里提到，大队送来的冬笋和芋头由于不便携带，照当地价格折算换成24元钱由哥哥带回交给集体。

写完这封信后，胡耀邦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经过几天考虑，他又想到1960年7月胡耀福来京时带的东西，于是又提笔写了一张清单，也由高勇抄清后交给他哥哥胡耀福带回。高勇记得，当时胡耀邦写的清单是：1、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2、豆子10斤，每斤0.1元，共1元。3、油饼60个，每个0.08元，共4.8元。4、熏鱼20斤，每斤0.7元，共计14元。5、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因此，家乡两次给胡耀邦带的土特产，按当时的市价折合人民币51.9元，让胡耀简、胡耀福带给了党支部书记龚光繁。

“今天人们看了耀邦的信和清单，可能认为胡耀邦实在是‘小题大作’。寥寥一点土特产，区区51元钱，算得了什么！而当时的胡耀邦，却提高到执行党的政策和损害群众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并教育基层干部也这样来认识问题，还不厌其烦地一笔一笔把账算清楚。”

借秘书衣服出国

胡耀邦对穿着上不讲究。高勇讲了“秘书借衣服给领导”的有趣往事。1962年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和购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耀邦一件咖啡色呢面大衣已褪了色，领子发了白，而且由于太旧了，熨不平。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找不到合适的。”当时，高勇新做了一件烤花呢大衣，他便向胡耀邦提议可以穿自己的这件新大衣去。“因为我的个子同耀邦差不多。他说可以试一试。拿来一试，能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这样，李汉平把高勇的这件大衣送到洗衣店熨了熨平，就成了胡耀邦出国访问的礼服。“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情，高勇都感慨不已。

关于胡耀邦的着装，高勇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胡耀邦接待外宾，上身穿了

一件新做的绸衬衫，可是里面贴身穿的汗衫脊背上却有3个破洞，隔着衬衫也看得清清楚楚。工作人员一致认为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李彦提出应换一件。耀邦问‘这样不行呀？’李彦说不行，我也说不行，这才又找了一件换上。”

高勇说，其实胡耀邦平时在家时，穿衣真是简朴极了，“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参加会议时，穿的也是一件旧中山装。”

1981年10月7日下午，胡耀邦和习仲勋把包括高勇在内的团中央主要领导干部约集到中南海勤政殿，作了长篇谈话。“耀邦抓了团中央两个‘小辫子’。一个是到北戴河休假，团中央占40%；一个是派了一些人到日本、美国去考察青年工作。对此，耀邦很不高兴。他说：‘我讲得不好听一点，是否有同志想利用这个机会去玩一玩？如果有这个想法，是不好的’。”高勇说，胡耀邦一贯反对铺张浪费，痛恨贪污腐败。

带饭盒上班的部长

作为秘书，高勇与胡耀邦朝夕相处，对胡耀邦精力充沛、勤奋刻苦、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等特点印象颇深。高勇回忆说，那时胡耀邦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的办公室与卧室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来不去床上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

高勇说，因为晚上比较安静，效率高，效果好，胡耀邦习惯于晚上工作和读书，几乎天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左右才睡。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习惯，秘书们都住在办公室，以便随时叫到。“他晚上工作或读书很少看钟表，只管埋头阅读，一看见我们则常问‘现在好多钟了？’”虽然高勇比胡耀邦年轻16岁，但是他坦言在熬夜这一点上实在是比不过胡耀邦。有时看秘书们实在熬不住了，胡耀邦就叫李汉平给他放一粒安眠药在桌上，要秘书们先去睡，而他什么时候睡大家就不知道了。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胡耀邦被打倒，直到1975年6月中央分配他去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兼副院长（郭沫若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院长），整整9年时间没有工作。高勇回忆那期间，胡耀邦似乎恨不得把耽误的9年时间一下子夺回来。“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工作，以尽快写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一个研究所、一个研究所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中午该吃饭时，到了哪个研究所就在哪个研究所打开饭盒吃一点凉饭凉菜，结果有一段时间造成消化不良。”高勇对胡耀邦说：“您已经是60岁的人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是受不了的。中午回家吃顿饭或让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胡耀邦听后也只是冲高勇淡淡一笑，什么也没说。

最大“嗜好”是读书

在胡耀邦身边工作那么多年，高勇深知，读书是耀邦工作之外的最大“嗜好”。“平时舍不得随便花钱，但遇到书，只要是他想看的，需要的，他从不犹豫，也不问价钱。他当时一个月工资才300多元，但有时一个月买书就要用去四五十元。”高勇说起一件趣事：那是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的前一天，即4月2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那次会场当场出售新版《列宁选集》四卷本，胡耀邦从家里出来时，根本没料到会场上会售书，他口袋里依旧一分钱都没装。经他说明情况，大会服务人员请他把书先拿走，随后再送钱来。散会了回家，一进院子他就冲高勇大喊：“高秘书，你赶快去给人民大会堂送钱，我买了一套《列宁选集》，还没有付钱。”

高勇本身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是说起胡耀邦读书的故事，他也不免赞叹不已。胡耀

邦非常重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据高勇所知，不算以前出版的单行本，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后，胡耀邦至少通读过两遍，《列宁全集》至少通读过一遍，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读过多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胡耀邦不仅反复读，而且还让高勇把建国前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文章仔细对照，都改写到旧版本上，看看毛泽东对各篇文章重新发表时是如何修改的，从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他善于博学强记，速度快，质量高，效果好，看过的书画了许多符号，写了许多眉批，摘录了大量卡片，写了大批读书笔记。他去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又重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这次重读这部巨著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24本！”

令高勇感到大受启发的是，胡耀邦读书习惯于同时交替读政治书籍和文学名著。“例如，阅读《列宁全集》的同时，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这样既是对脑筋的调节，又可以充分利用时间。他经常是把工作快速处理一下后集中读书，速度快得惊人。他还很喜欢读人物传记，凡是能搜罗到的世界各国的主要名人传记他都读过。他对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阅读的古诗和诗词曲赋，有许多篇他都能背下来，还常常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高勇因为也有国学方面的爱好，他成了胡耀邦读古文名篇时的“好搭档”。他们曾一起背诵过毛泽东的诗词、鲁迅的诗，以及韩愈的《祭鳄鱼文》、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及《后出师表》、林黛玉的《葬花诗》、《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判词，还有许多唐宋诗词和元曲小令。

高勇收藏着胡耀邦一份珍贵的墨宝“孜孜不倦”。

1986年10月8日晚上，高勇同刘崇文去中南海看望胡耀邦，他事先带着一本大册页，是一位朋友为他特制的，放在李汉平处。高勇对李汉平说：“等耀邦同志写字时，请你顺便请耀邦同志也为我题几个字。”不想，只过了3天，10月11日下午3点多，李汉平来电话告诉高勇：“耀邦同志准备为你题字，让我问你写什么。”高勇说：“可以针对我的缺点或特点定，也可以写鼓励性的话，请耀邦同志决定。”下午5点钟，李汉平又来电，告诉高勇：“耀邦同志为你题写了‘孜孜不倦’四个字。”高勇十分兴奋。10月21日晚上，李汉平与爱人来高勇家串门，将胡耀邦的题字带来了。高勇自然懂得胡耀邦题词“孜孜不倦”的深意，“他一生工作、读书孜孜不倦，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也要勤奋刻苦”。

高勇说，胡耀邦读书，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坐得住，读得进，并持之以恒。他们下放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时，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到了晚上，许多人也根本无心读书学习。可是，胡耀邦却钻进蚊帐，点着马灯，戴着老花镜，孜孜攻读。在那种情况下，他利用那段空闲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在此期间高勇曾去看过胡耀邦几次，每次见面的第一句话，胡耀邦常常是关心地问高勇最近读什么书了。高勇要是说读了什么书或正在读什么书，他就显得很高兴。要是说没读什么书，他的表情就会立即严肃起来。

有一次，胡耀邦语重心长地对高勇说：“一些人来看我，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心里很着急。我同他们说，没有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可以多读点书嘛！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高勇想，正是由于他那段时间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思考了许多问题，他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水平又发生了一次新的飞跃。之后，无论是去中央党校工作，还是到中央组织部或中央宣传部工作，他都能使那里的工作迅速打开局面，机关面貌为之一新，以至这些部门的同志都把他主持工作期间称之为这些部门的“黄金时代”。

■ 责任编辑 郭爱凤